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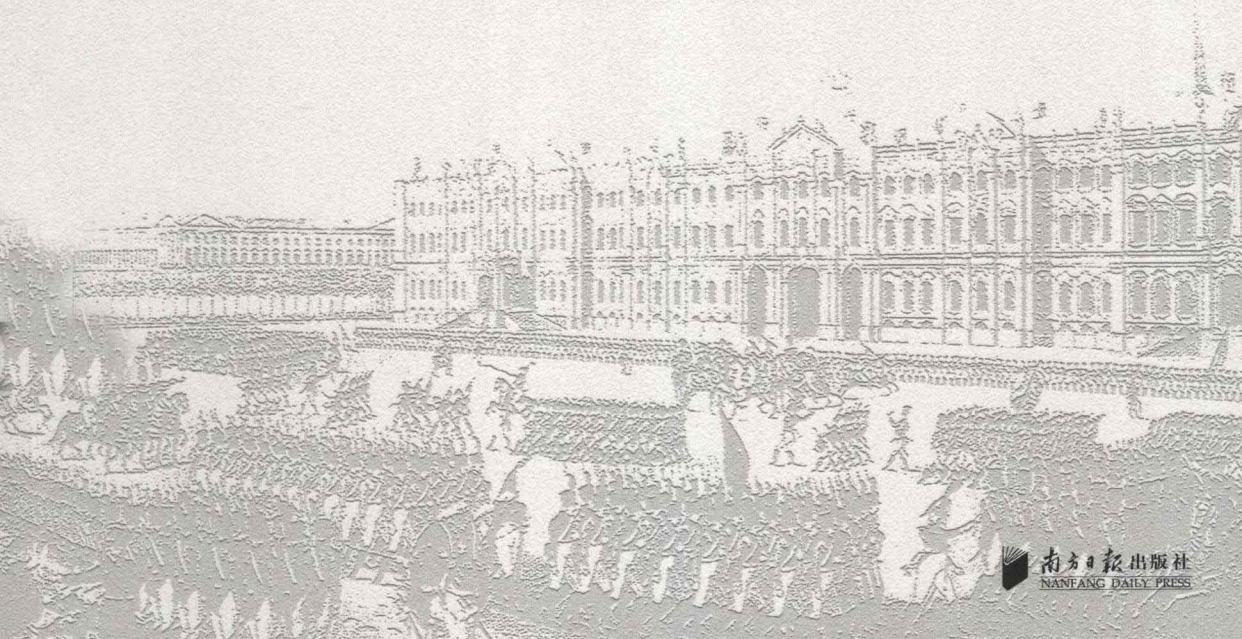


[第2卷]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2001

俄罗斯史

(英)杰弗里·霍斯金 著 李国庆 宫齐 周佩虹 郭燕青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RUSSIA
AND THE RUSSI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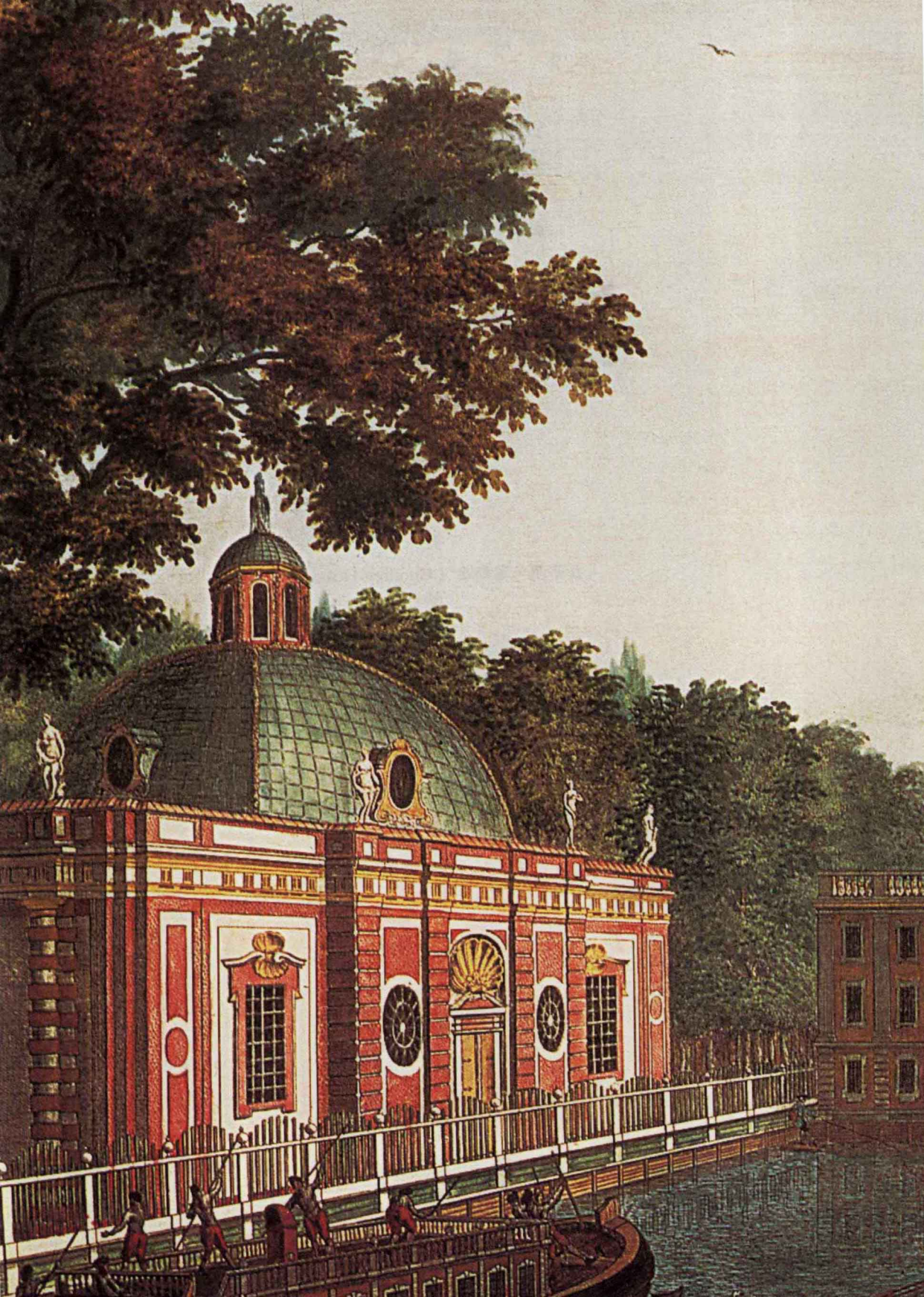
俄罗斯史

[第2卷]

(英)

杰弗里·霍斯金 (Geoffrey Hosking)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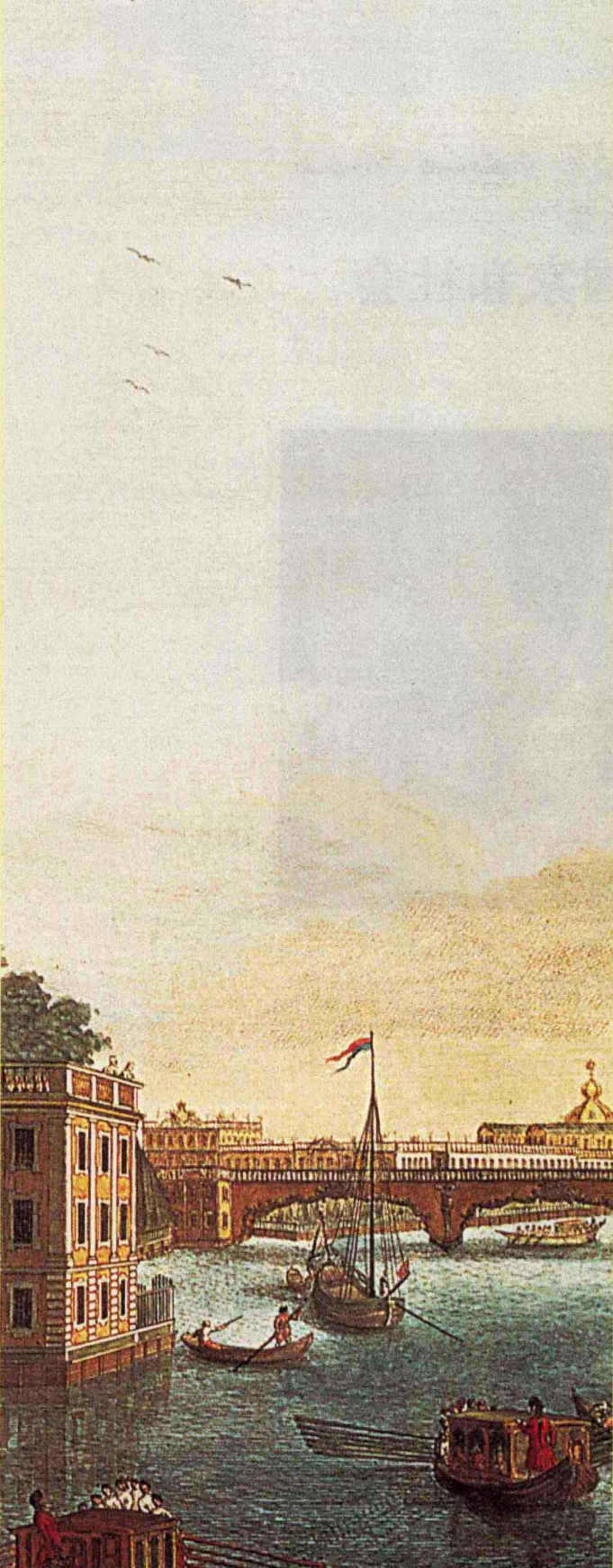
李国庆 宫 齐 周佩虹 郭燕青
译



PART THREE
第三部分

RUSSIA AS EUROPEAN EMPIRE

欧洲帝国



18世纪初的圣彼得堡。

18 世纪的国家和社会



18世纪俄国农村家庭。

权力、机构和法律

彼得一世时期的政府改革和社会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只是象征意义上的革新，还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在彼得“从黑暗走向光明”之中，他巩固甚至加强了莫斯科社会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彼得看来对“进展”又是极其不利的。彼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洛特曼观点的典型例证，彼得一世时期俄国表面上最彻底的变革在事实上却是巩固了他们想要改变的社会传统。

18世纪的实权在三个机构之间波动：（1）政府：参议院，圣议会，委员会；（2）各种不同名义的君主顾问委员会；（3）君主个人所宠之人。并非所有被选为上层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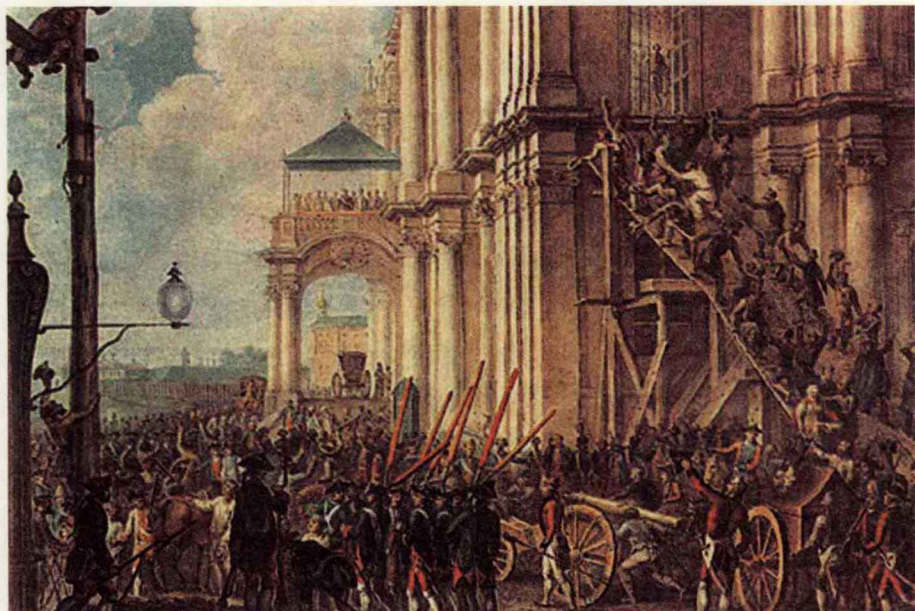
官之人都对此感到满意——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显赫地位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瞬息即逝。1730年，最高枢密院（第二种机构类型）的成员试图让安娜女王在其在位期间承诺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她在结婚、指定一位继承人、决定战争与否、增加税收、花销、指派政府高级官员或进行土地拨款之前都必须征得最高枢密院的同意。如果他们成功了，俄国理论上就可能成为类似于18世纪英国辉格党的君主立宪制。但是，正如贵族们的抗议书所示，绝大多数贵族认为如果君主权力受限，贵族总体上只能在议会中成为实现受限权力的合适代表。贵族们认为要求安娜女王承诺某些条件仅仅是戈利岑和多尔戈鲁基家族想要延续自己家族权势所使用的策略，目前这两大家族在最高枢密院中掌握着领导权。因此，贵族们奉劝安娜女王拒绝这两大家族的请求，女王也确实按照这些贵族的要求做了。

1754年，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孟德斯鸠和伊凡·舒瓦洛夫提议，君主及其臣民应宣誓遵守某些“永久、基本的法律”，例如，这些法律能够确保土地的神圣所有权不可侵犯，以及贵族阶层为之努力的贵族权利。或许是受到他们的启发，伊丽莎白女王责成伊凡的兄弟彼得率领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尝试将这些思想用法律法规体现出来。这项工作完成了很多，但所提建议并没有得以执行。

与其前任沙皇相比，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对机构和法律有更为直接的兴趣，因为她的王位所有权要远弱于其他国王，这主要是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并非任何罗曼诺夫王朝家族分支的后代。由于缺乏臣民的稳定支持，她总是更容易遭到军官们的阴谋威胁，这也体现在机构和法律之中。在执政之初，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主要顾问尼基塔·帕宁曾计划将彼得一世的“常规国家”加以系统化，并提议创建帝国理事会。这个帝国理事会不仅要向君主提供建议，同时也拥有最高行政责任，并具有不同的分工，职责类似于根据法律框架而制订的一种部长会议。他的提议实际上是将君主制度限定在了由大贵族家族构成的权力网之中，这些大贵族家族通过出身、地位、功绩以及阅历来证明自己的大贵族身份。

即使这项在所有人看来都很公平的建议，仍受到了宫廷里变幻无常的竞争的影响。当主要顾问帕宁的对手在叶卡捷琳娜女王的随从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时，帕宁收回了他的建议，这毫无疑问是因为担心这些提议的实施将巩固其对手的影响力。

叶卡捷琳娜女王在为其即将负责的王权做准备时，阅读了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作品，由此对政府如何改革以及法规的引入有了自己的想法。叶卡捷琳娜女王认为法律应得到臣民代表的批准才能生效，这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在1767年，她召开了一次法典委员会，委员会由社会不同地区的选举代表组成，会上主要通过了她



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

由于彼得三世执行亲普鲁士方针，损害了俄国贵族的利益，1762年7月9日，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处死了彼得三世。



18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王战胜土耳其

叶卡捷琳娜女王在位期间，利用战争大大扩张了俄国的版图。

自己的一套提议，这些提议被清楚地记载在了备忘录上。

叶卡捷琳娜女王对法律规章的设想与彼得一世非常接近。她认为法律是国家调动社会资源来增强力量和增加财富，为百姓提供福利的一种方式。在她看来，法律并非是一股斡旋于相互竞争的自治社会机构之间的客观力量，而是一件工具，君主

凭借它行使权力，并将道德准则付诸实施。“在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在一个法制已经建立起来的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自由仅仅能够存在于每个人应该渴望做事的能力之中，而并非存在于被迫去做被希望去做的事情中。”这是德国经济学家的观点，而非法国或英国的启蒙思想家的看法；自普鲁士以来，许多德国君主在他们相对较小的国土内积极将此观点付诸实践。

法典委员会由各方选举代表组成，包括贵族、城镇居民、哥萨克人、自由民（把守南部前线的士兵的后代）、“黑”农以及非俄国人。很明显，农奴和神职人员并未包括在内。委员们带着自己的备忘录，代表选民们表达他们的悲痛和希冀。当委员会于1767年7月第一次召开会议之后，有一点变得清晰起来，那就是每片地区的人们都有自己狭隘的利益设想，在提出这些利益的时候，他们未从整个国家或人民的角度来考虑新的法规的实施。由于这些会议是在纯本土环境中召开，没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制度性框架作背景，因而他们没有整体利益的概念，也没有考虑到整个俄国民众的需求。

1768年，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叶卡捷琳娜女王最终决定法典委员会全体休会，这样委员们在解散后可以去服兵役。她没有再次召集他们，但是小组委员会仍在继续工作。1780年，委员会秘书处编订了一部关于现存法律的十卷本的汇编。叶卡捷琳娜女王依据此汇编获取信息，但她并不想仅仅为了在地区利益之间进行裁决和平衡而制定法律，或许她认为自己及其顾问能够提出非常重要的观点，比那些选举产生的议会所提出的观点要好。随即俄国出现了一个长久的进退维谷的困境：代表机构常常只支持现存的特权，从而加剧了社会冲突。

叶卡捷琳娜女王在这个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几乎不同于18世纪欧洲的其他任何一位君主。他们必须同时使用权力和法律来消除市政当局和地方机构的特权及豁免权，而叶卡捷琳娜女王的问题则相反：这些机构在叶卡捷琳娜女王时代过于软弱。由于俄国自身的发展方式，这些机构过于弱小，甚至无法起到政府权力传送带的职能，因此，庇护关系和贡金收取仍然构成了叶卡捷琳娜王朝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主要因素。

叶卡捷琳娜女王推迟了中央律法的制订，转而开始加强中间层社会机构的建设——这是彼得大帝最失败的领域——希望创造一个社会阶级来填补这个空缺。她以前任沙皇从未有的拼命精神来解决地方政府的问题。她把整个国家，包括近来所征服的领地，分为50个省和大约360个区。每个省都由君主亲自任命的省长领导，同时还领导一群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地方官员，有时出于特殊原因，还会任命

总省长来管理两个或更多省份，例如边境地区。每个区则由警员和当地贵族议会共同领导，通过选举来任命官员。区贵族司法官主持贵族议会，在所有政府事务中代表地方利益。

由于贵族在这个计划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叶卡捷琳娜女王于1785年授予了他们一份特许状：贵族早在1762年就被准许免除兵役。当时他们在每个区、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联盟，这些联盟并非完全能掌控自身的人员数量，因为凡是拥有恰当的社会身份及最少的土地和农奴的人，都有权加入这些联盟。但是，贵族身份只有在做了有损于贵族荣誉的事，且经过其他贵族审判裁决之后方可撤销。因此，庄园贵族成了俄国第一个受法律保障的社会阶层，特许状的颁布更使土地和农奴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是俄国第一次以非军事形式成立的可行的地方政府协约。一个由官秩表中规定的前八个阶层组成的统治阶级，结合了西化文化和农奴制，进入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军事指挥部以及外交部门。正如约翰·莱顿尼所说：“农奴制与贵族至高无上的政治霸权、统治阶级的合法地位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分割。”

同时，农奴制使得近半数人口无法接触到政府和法律。实践证明，关于哪些人应该被界定为农奴，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农奴的问题，要想通过法庭来强制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是不可能的。

叶卡捷琳娜女王同样授予了城镇居民特许状，虽然没有贵族的特许状那么令人羡慕。这样，通过他们的村庄社区，农民的财产权和合法地位将受到法律的保护。但该草案拟定后，由于一些未知的原因，从未得以颁布。或许是因为女王的改革削弱了农奴的地位，因此她担心这会激起私人农奴一些徒劳的期望。

除了贵族阶层的权力，俄国缺乏基本的法律和有效的市议会，可以说俄国的实质是由那些顶层的贵族家族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如果没有他们持续的努力和对新欧洲秩序的认同，俄国就如同在无情、跋扈的沙皇伊凡四世的统治下沦为“动荡时代”的受害者那样，可能早已经成为彼得大帝死后的另一个“动荡时代”的受害者了。

军队军官——尤其是警卫团的军官——处于社会和国家的中心。只有地位最高的家族才能够荣耀地在警卫团的指挥部任职，而那些出身卑微的人则只能靠自己的打拼来谋求晋升。正如莱顿尼所说：“警卫团构成了首都统治家族和他们在军团的委托人之间的政治联系，体现了统治阶层所具有的作用，捍卫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尽管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从未在任何具体制度中体现出来，但这种精神

对于从 1725 年彼得大帝去世到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期间俄国的生存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废除现存的继承体系，彼得一世甚至曾试图取缔生物学这门课，因为他认为生物学限制了君主的意志。结果在 18 世纪，在一片混乱中，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两大家族的后代在警卫团的支持下夺取了王位，后来他们的王权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剥夺。

新式贵族的诞生事实上是成功的，因为他们能够自我维系。起初，年轻的贵族男性不愿去“译码学校”学习数学、航海和工程，但是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很快开始理解和接受圣彼得的精神。转折点很可能是少年军团的成立，尽管他们有贵族头衔，但训练的目的在于要培养未来的公务员和军队军官。除了学习实践知识，他们还要学习文化、礼仪和社交风度，以期能与欧洲贵族打成一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们通过所学的知识，逐渐明白了区分贵族与非贵族的重要标准，并把这种标准视为一种骄傲。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接受并传播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他们的部分同胞看来是反基督教的产物。

一些年轻的贵族被送往法国或德国的大学学习，起初他们如同一群难以管教的男生一样被带队送出去学习，之后则根据个人的选择单个前往。结果，在 18 世纪后期，很多名门望族开始在社交中使用法语，有时甚至在家中也如此，只有当跟仆人、农奴及小孩交流时才使用俄语。这些贵族开始接受西欧文化，并使其成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他们也悲叹西欧文化在俄国的缺失。这就如同 19 世纪后期那些在英国私立学校接受了教育的印度王子，在回国的途中，仍怀念那些他们从小在英国所学的成熟的社会交往和学术知识。

但是，俄国并非殖民地，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文化上，贵族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这种殖民风格的裂缝变得愈加不可协调，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将俄国贵族视为俄国的异类。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是这样描述贵族的：“他们在外人当中试图显得更无拘无束，而在本国却成功地成了俄国人眼中的外国人。”马克·拉伊夫同样暗示说贵族们在欧洲的旅游和留学经历淡化了他们的国家观念。

米歇尔·康菲诺质疑过这些说法。他指出，贵族仍可在俄国机构任职，退休之后可回到自己的庄园，致力于地方事务；他们小时候可能是和农奴孩子一起，由农奴保姆抚养长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保留着对童年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

康菲诺无疑是正确的：俄国贵族绝不是不爱国，他们在文化上是典型的俄国人。事实上，他们可以被视为俄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意识的爱国分子。但是克柳切

夫斯基和拉伊夫也有一个观点：贵族的俄国意识与农民、大多数商人和牧师的俄国意识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一种帝国式的俄国意识，这种意识以少年军团、警卫团和帝国宫廷为中心，充满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甚至他们的庄园都印有欧洲文化的色彩，被他们视为欧洲文化中半开化的海洋。乡村的俄国意识对他们而言很重要，但他们知道这是不同的。这是词语“rossiiskii”和“russkii”之间的分歧，是帝国俄国和民族俄国之间的分歧，这一点在19世纪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两者不合并，就无法创建一个属于俄国人的国家，但帝国的压力会使二者分隔得更远。

财政需求和经济结果

为了支付巨额的新型军事开支，彼得一世及其继任政府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手段是征收人头税，该政策于1724年开始全面实行。凡是在应税地区登记在册的男性，即农民（包括农奴）和城镇居民，都需缴税。该税收是否立刻导致了税收负担的大幅增加仍存在着争议，但有三件事是很确定的：首先，不考虑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而对所有人征收相同的税费，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它加重了那些无力支付的人的生活负担；其次，由于社团是通过“共同责任”结合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团结一致，取长补短，以确保没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换言之，彼得征收人头税只是产生或加强了以财政角度为动机的公平；第三，虽然征收人头税使税收

更为容易计算，但要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才能确保按人头征收税收的工作能够得以有效的落实。然而，人口普查很难开展且开销巨大，并会使应予课税的城乡居民永久性地待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1724年国内护照开始实施，彼得大帝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其目的是使所有“贫民、流浪汉和居无定所的民众”回到他们应该缴税的社区去。

彼得一世没有创立新制度，而是通过巩固旧制度来引领俄国，军事改革以及同



17—18世纪，证明持有者已缴纳税金的印章

在彼得大帝的剪须运动中，出高额税款的人可以不剪须，这些人也要佩戴上这种纪念章。

时进行的财政改革就是很好的证明。他采用相对简单、条理清晰的传统俄国社会结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与其竞争的欧洲君主只能依靠地位牢固且拥有特权的市议会。但是中间层面机构的缺失同时也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例如，除了地主，没有地方官员能够被委任开展人口普查，而地主肯定会尽量少报自己拥有的农奴数量。结果，人口普查交予由负责给部队提供食宿的军队军官来执行，这使整个征税过程看起来就像是驻军在征收贡金。

制造业的发展也存在相似的自相矛盾的结果。彼得是一个坚定的重商主义者，赞成发展私营企业，由国家提供合同担保和保护性关税。由于需要新纺织工厂来生产军队制服，同时需要军械工厂和金属制造厂来生产武器和弹药，他诚邀企业家建厂；当企业无法找到充足的雇佣劳力时，彼得将附近社区的农民“指派”给他们作劳力。这种国家保护和扶持的“私人”企业体系，由于使用了工业农奴，在18世纪有了较好发展，使俄国能够支撑起庞大的军队，并且成为欧洲第一铁矿出口国。但同时，它也巩固了以庇护关系和初级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制造业体系，这从长远来看很难适应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

财政改革和工业改革最为深远的影响是确定了俄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严格的、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当时俄国在南部和西部征服了肥沃的领土，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提供了机遇。那时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问题显得十分关键。18世纪期间，很多贵族都得到了沙皇馈赠的土地和由此成为农奴的“黑”农，沙皇的这种馈赠有时非常慷慨。这些可任其支配的资源本应使他们成为重要的企业家，使他们能够利用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公务职责和对落后农业经济的依赖却阻碍了他们利用此次良机。

地主地位高于所有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多半忽视农业，而且从不指挥军团和管理远地省份，提供知识、工具、家畜和种子的都是农民。因此，为了经营好自己的庄园，地主很依赖他们的管家，以及管家与农民群体建立起来的关系。有些地主通过让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在村庄中担任关键职位来经营自己的事务，但是很多社团都会有自己青睐的候选人，由于需要与那些享有村民信任的人共事，管家通常会提议不要否决这些社团提出的候选人。

这样，大多数地主的田地开始以巨大的农民租种地的形式进行经营，以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带状耕种。这虽使当时的村庄社区保留了下来，但却极大地阻碍了创新精神。与以前相比，当时租种土地要承担更大的负担。贵族们觊觎那些展品或炫耀性消费，这些都是他们在更为富裕的邻居家里，或以外交官或军队军官身份在国

外所看到的東西。他們喜歡用西化的物品來裝飾自己的莊園：精美的家具和畫作，名設計師設計的花園，以及室內裝飾。他們穿著法國風格的服裝，喝著法國進口的葡萄酒。無論他們的土地多大，他們購買這些物品所需的開支遠遠超出了農民租種土地繳納的租金。少數地主也曾嘗試提高農業產量，生產市場所需的農產品和原材料。但是由於大多數地主缺乏農業或會計學知識，因而無法確定其莊園的哪些方面能獲取利潤。通過增加農民的租金來對其施加額外壓力、抵押部分莊園或者利用宮廷關係來獲取官方貸款，這對大部分地主而言更為容易。整個這一體系實際上使早該在兩百多年前就被廢除的食邑制存在得更為長久。

官方貸款通常是隨要隨有：權力部門不想見到他們的主要奴仆破產。1754年貴族銀行建立，其明確的目的就是以優惠條款為貴族們提供貸款，其結果是導致了堆積如山的債務：到1842年，半數的農奴都作為貸款抵押品抵押給了貸款機構；而到了1859年，抵押的農奴數量超過了三分之二。

可以說，在這種制度下，遭遇最慘的不是農奴，而是城鎮居民。他們享受不到沙皇的特殊恩惠，卻還得承擔沉重的賦稅，履行缺乏保護的官方義務。城鎮，包括其機構和居民，仍在行使著和村落一樣的職能：為國家提供新兵、稅收和其他服務。博薩德城市居民也有自己的集會，和村民一樣，“共同責任”把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們長期待在自己的居住地，禁止離開，除非得到選舉產生的掌管事務的長者的准許。逃跑者會被抓回並加以教化，整個社團都十分熱衷於干此事，因為如若不然，他們將要償付那些潛逃者未償還的債務。

國家沒有給予城鎮居民在貿易和製造業方面任何壟斷權力作為義務責任的補償——雖然城市商人在1721—1762年確實有权擁有農奴。農民、地主的雇工以及其他人都能在市區街道做生意，因為他們沒有城鎮居民的那些負擔，所以價格通常會比城鎮居民的價格要低。

葉卡捷琳娜二世在1785年給予城鎮居民特許狀，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改變現狀，但該特許狀所授的權力遠遠沒有授予貴族的特許狀那麼慷慨。資產超過500盧布的商人被視作精英，擁有自己的專責事務和特權。他們不用繳納人頭稅，免于體罰，並且有权通過支付一定費用而免于服兵役。城市居民被分為六類，每一類在理論上都是獨立的團體，有权處理自己的事務和選舉市政委員會的代表。市政委員會在市長的領導下監管城鎮的一切事務。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结构，但仍然存在不足：在“共同責任”的引領下，商人不用繳納人頭稅，這增加了其他城鎮人口的負擔。此外，城鎮仍然是服務區結構的一部分，然而居民們沒有特殊的自由。舉例來



俄国农妇在水井旁汲水

18世纪反映俄国农村生活的绘画，当时的农村人口增长迅速。

说，他们不能够收留农奴，也不能赋予农奴自由。因此，城市的市政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形同虚设。

由于在城镇居民身上有很多强加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尽管在经济上仍存在不足，但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更为安全的生活之地。农奴至少能确保一小块土地和最低收入，相比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更是安全的收入来源。因此，俄国城镇人口比例从18世纪40年代的11%下降到19世纪60年代的7%，这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相反，农村人口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增长迅速。所有农奴制的支持者都希望增加农村人口。地主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他们通常用拥有的农奴数量作为衡量自己地位的指标。农村公社需要尽可能多的工人来分担支付费用的责任，每家每户都注重早婚和生育大量子女，因为这样他们将有分权分配新的土地。

人口增长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机遇。幸运的是，人口的增长恰逢南方新土地的开垦，这意味着谷物价格变得更加便宜，并且能够沿着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将谷物运往俄国在欧洲区域内的大多数地区。这些新的资源能帮助农民，尤其是来自北方较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从持续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必再在贫瘠的土地上为获取农产品而疲于奔命。他们可以从事其他谋生的职业，而非要永远从事农业工作。庄园主通常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佃农赚取收入，然后将劳动收入兑换成现金或实物；如果需要，一年中至少会有部分时间准许他们离开农村。

离家外出工作的农民常会组成合作社，这是一个把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同时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组织。他们通常共同拥有劳动工具，居住在一起，推选一位百岁老人或长者来与雇主们协商，收取工资并分发给合作社的成员，同时他们还要常常留心工作规定。合作社在某些方面与农村集会类似，它体现了一个信念：工作实践和与外界的关系能够通过集体达成共识，从而得到最佳的处理。

因此，到18世纪末，家庭手工业代替农业，成为整个农村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莫斯科服装市场的飞速发展，莫斯科北部和东部的农村专营亚麻和丝绸编织，之后则以棉织为主。以伊凡诺沃的舍仁梅托夫庄园为中心的弗拉基米尔和科斯特罗马省则是另一个专业纺织地区，该地区在19世纪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工业城市。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皮革和金属加工业也得到发展，同样是在舍仁梅托夫庄园区，其中之一的巴甫洛沃地区由于专门生产锁、刀具、剪刀和外科器具而被称为“俄国的谢菲尔德”。另外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农村典范是梅斯特拉，该村是帕宁伯爵在弗拉基米尔省的资产。该村的农民生产廉价的圣像、印刷品和石版画，然后由一些不法商贩销往全国各地。

虽然圣像和印刷品并不十分挣钱，但就大多数产品而言，家庭手工业与大型制造业相比拥有很大的优势。由于交通联系不畅，因此很难将大型产品运往远处，而家庭作坊规模小，灵活性强，更加适合区域性或本地市场。早期重工业的发展不但没有招致破坏性的竞争，反而通过提供基本工具和培训农民使用工具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约1850年，下诺夫哥罗德商人在饮茶

19世纪，下诺夫哥罗德省的皮革和金属加工业得到发展。

早期的企业家一般都是农民，几乎都是私人所拥有的农奴而非国家的农民。地主角色至关重要，他们不仅仅只是允许农奴创业，而且还通过各种方法为生产活动铺平道路，如为他们提供创业资本及可用的原材料，支持劳动纪律的建立，确保

贸易特权和特惠运输关税等等。他们也可以进行干预，确保农奴企业家死后资产不会被所属公社的其他成员瓜分。19 世纪末，一些重要的俄国企业家仅仅是那些年高德劭的农奴们的第一代或第二代，这些农奴建立了工厂或制革厂，雇佣劳动工人，并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从领主手中赎回他们的自由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

因此，俄国早期工业化的国家传统主要是农村化和小规模，虽然也存在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俄国的早期工业足以维持国家武装力量，支持国有机构，以及维护自身的大国地位。直到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达到了其自然极限，暂停了进一步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经济结构予以国家或地主过多的保护、庇护关系，而不是资产与合同，成了投资的基础。

国家以从经济中榨取财富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该种经济结构的仿古影响，并非只是通过人头税将人口平分归市、镇所有。18 世纪中期，七年战争的需求使得寻找收入的额外来源变得明确起来。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提高间接税，尤其是酒水税：比起讨伐那些不愿支付人头税的人而言，从酒徒手中诱骗钱财显得简单得多。在庆祝会时纵情饮酒是俄国的大众传统，如果在这种场合不大量喝酒会招致坏的名声。

一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国家的酒水垄断权力都转让了出去，这成为代理商，包括官员、地主和收税员（后者在西部省份通常由犹太人担任）发财致富的一种方式，直到 60 年代酒水税才被消费税取代。酒水收入在 1759 年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五分之一，19 世纪 50 年代则上升到了 40%。包税人毫无顾忌地通过非法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掺假、短斤少两或者以次充好。省级官员忽视这些违法行为，常视贿赂所得为其收入的正常部分。正如一位时事评论员所说：“警官本身就被转包给包税人了。”

国家最初为了在财政上支持 1768—1774 年的土耳其战争，从 1769 年开始定期发行纸币。由于该纸币并未以金银价值为支撑点，因此开始贬值，到 1817 年 1 卢布的价值只有 25 戈比。19 世纪 20—40 年代之间，财政部把纸币定为国债，赎回并且销毁，希望以此来恢复金融信用，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没能完成此项任务。克里米亚战争和 1863—186 年镇压波兰叛乱的巨额开支引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动荡。

当时整个俄帝国依靠纸币和普通百姓的酒水税来维持金融稳定，这说起来未免有些夸张，但并不奇怪。由于战争会带来巨大的财政损失，因而不管何时都要尽量避免。为了维持帝国的运转，俄国超越了自己的极限，在当时的科技

水平下过度地使用了勉强可以提供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俄国的这种需求破坏了企业的正常运转，阻碍了国内市场发展，限制了有利于科技水平提高的投资。当时包税制¹在其他国家已广为人知：古罗马和17、18世纪的法国就十分依赖于包税制，但是在这些国家，包括在俄国，包税制阻碍了公平的税款征收，抑制了经济增长，缩减了国家调动有效财富的能力。

对农民而言，这些制度繁重且有失公正，但并非无法容忍。国家或地主都无意把农民剥削到不堪忍受的地步。此外，与土地紧密相连至少意味着农民能够确保土地，并且在正常年份能够靠土地维持生活，而不像同期一些欧洲国家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因圈地运动和其他市场经济手段而大幅缩减。就理论上而言，在俄国，地主甚至有责任在饥荒时为农奴提供粮食。史蒂芬·霍奇关于坦波夫省加加林地区彼得罗夫斯克城市的研究表明，在正常年份里，农民可以过上较好的生活，不亚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农民。在歉收的年份，在那些经营良好的庄园中，管家会从地主的谷仓中分一些谷物救济农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些年份，例如在1833—1834年，国家并没有提供充足的粮食以避免生存危机。作者的结论认为，农奴们靠的是“家长式的但却十分有限的福利体系”来维持生计。

这无疑是家长式的管理：地主或其管家事实上就是收税员，他们也负责招募巡佐和警员，为农奴向法院提起上诉——这是一种完全公开的权力滥用关系，但却确保了双方的生存底线。

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这些职能实际上越来越多地由村社本身来执行，尤其是在征税和招募新兵方面。随着程序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和书面化，村社的民选官员成了国家结构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即使在村社仍负有维持农户法人组织的职能时，也是如此。

当时农民如果致力于传统农业实践，支付租金并服从于地主及其管家，他们就能够勉强度日。对农民的要求使他们对生活抱有一种谨慎和主张人人平等的态度，“共同责任”是其中心所在。“共同责任”简化了税收和服兵役的问题，这对地主而言非常有用，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确保农民在正常（除异常罕见的危机外）情况下的最低生活需求，极大地简化了国家的行政工作。

“共同责任”丰富了农民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憧憬，包括经济、工作模式、文化、法律、财产和权力等方面。“共同责任”的原则在村民委员会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村民委员会由村里所有户主组成，通常都是最为年长的男性，极少情况会有女性户

¹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者地区）的一种税收包干上缴的办法。